



蔡和森：曙光中的先驱

他第一个明确提出成立中国共产党，并率先垂范，为革命呕心沥血，英勇奋斗，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像漫漫黑暗中的夜明珠，以自己的智慧、行动，照亮积难深重雾海茫茫的旧中国的星空，找到了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蔡和森。

A 湖湘风骨：革命沃土中的萌芽

1895年3月30日，蔡和森出生在上海。他的父亲本是江南机械制造总局的一个小职员，但行事不检，官僚气十足，这令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难以容忍。1899年，4岁的蔡和森随母亲回到位于湖南娄底双峰县的老家。双峰县有3家名门望族，蔡母娘家葛氏家族是其一。剩下两家望族，一家是清代名臣曾国藩的曾氏家族，另一家则是“鉴湖女侠”秋瑾的婆家王氏家族。

葛健豪不同于传统女性，儿时的她就聪明过人，随兄长在家馆学习，能识字、读书。哪怕是结婚后，她也仍关注社会民生。葛家与秋瑾婆家王氏家族相隔不远，从上海返回娘家后的葛健豪听闻秋瑾能文能武，是一位“巾帼奇人”，便几次去拜访。与秋瑾的几次交谈，让她大开眼界，接受了新思想。从此以后，葛健豪就常教导儿女学习秋瑾忧国忧民、男女平等的思想精神。

1907年，秋瑾因安庆起义失败，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这给从小就听闻她英雄事迹的蔡和森以极大冲击。这时，清政府已垂垂将倾，蔡家也家道中落，无力支付子女学费，蔡和森因此去堂哥家的辣酱店做了学徒。做学徒期间，他饱受凌辱与剥削，自己读的书

总是被撕得粉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地处南北要冲的湖南更受革命风气的感染。16岁的蔡和森立即剪掉自己头上的辮子，并积极推动家乡开展剪辮子运动。

蔡和森学徒期满后，母亲变卖了家产，使他重回小学。但那时他因为年纪太大，被人戏称为“大学生”。好在他聪明好学又孜孜不倦，1913年他考入湖南铁路专门学校。他特意选上这所学校，是因为该校有许多同盟会的成员，革命氛围浓烈。半年后，因局势动荡，他又转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里，他结识了毛泽东，二人迅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杨昌济称赞他们：“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毛泽东与蔡和森不仅是思想理论的探索者，更是心怀天下的实践者。1918年夏天，他们沿洞庭湖东岸与南岸的各县游历，深入劳动人民中，了解社会现实。这次经历，使他们深刻体会到劳动人民的疾苦，坚定了对工农武装斗争的信念。他们与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组织了新民学会，创办了宣传新思想的《湘江评论》，并积极参与五四运动，为日后的革命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B 远赴重洋：法国勤工俭学中的理想追寻

1918年6月，杨昌济向蔡和森传达了李石曾、吴稚晖等人正组织留法俭学会的消息。

留法俭学会的宗旨是：改良社会首重教育，欲输世界文明于国内，必以留学泰西为要图，惟西国学费俗称耗大，其事至难普及。曾经同志筹思，拟兴苦学之风，广辟留欧学界。今共和初立，欲造成新社会新国民，更非留学莫济，而尤以民气先进之国为最宜。兹由同志组织“留法俭学会”，以兴尚俭乐学之风，而助其事之实行也。这与新民学会的宗旨不谋而合。蔡和森与新民学会成员商讨后，认同赴法留学是开拓中国青年视野和知识的关键，特别是法国乃巴黎公社革命的发源地，又有接近东欧的地理位置，使他们能够学习欧洲工人运动和俄国革命的经验。于是，蔡和森即刻动身前往北京组织赴法运动。

6月25日，蔡和森抵达北京，通过杨昌济的引荐，与蔡元培、李石曾等人会面，成功争取到25个赴法名额。随后，部分学员开始在留法预备班学习法语。1919年12月25日，蔡和森前往法国，毛泽东为他送行。初到法国的他法语并不好，但他有着湖南人的“霸蛮”精神，“日惟手字典一册”“猛看猛

译”马克思主义著作。通过不断地阅读、比较，他翻译出许多马克思主义重要著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俄国革命经验打下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不断学习与翻译，让蔡和森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他介绍了与马列主义相关的思想与著作。他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党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并得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结论。更了不起的是，他首次向毛泽东提议组织“中国共产党”，并详细阐述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理论。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对于蔡和森的提议，毛泽东回答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1920年7月，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主张在“蒙达尼会议”上被首次提出。

在法国期间，蔡和森不仅进行理论研究和翻译，还积极组织并领导勤工俭学的学生，推动他们的革命斗争。1920年底，蔡和森与周恩来登上巴黎圣母院的塔顶，俯瞰塞纳河畔，他们决心在欧洲成立一个共产主义团体。1922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在法国成立，揭开了中国革命海外组织的序幕。

C 异乡的呐喊：勤工俭学留学生在法国的抗争

1921年初，赴法中国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们陷入了严峻的生活和学习困境，失业问题日益严重。蔡和森等人发表了《蒙达尼勤工俭学同人意见书》，向当时的中国政府提出，“做工不能达到求学的目的，要求生存权、求学权，请补官费。”面对困境，蔡和森又组织400多名学生前往巴黎的中国驻法公使领馆请愿。但这一行动遭到了拒绝和镇压，导致多名学生受伤。

最终，这次行动促使法国和中国驻法使馆开始发放临时维持费。然而，由于中法大借款事件，留法学生的生活保障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蔡和森等人继续争取在中法大学学习的权利。1921年5月，他们决定联合起来，推动开放里昂中法大学，并计划将筹集的资金用作学费支持。在法国各地，勤工俭学的学生们纷纷响应蔡和森的号召，成立组织，积极争取就读中法大学的机会。

9月17日，“各地勤工俭学学生联合委员会”在巴黎成立，把开放里昂中法大学作为唯一目标。9月20日，蔡和森带领代表团前往里昂，要求就读中法大学，但遭到校方和里昂市长的强烈反对。面对里昂市长的威胁与恐吓，蔡和森等人仍发放传单争取支持。10月10日，他们又组织被拘押的学生绝食抗议，但最终无效。3日后，104名中国学生被强行押送至马赛，随即遣返中国。

以蔡和森为代表组织的法国学潮是五四运动后中国早期赴法留学生在异乡为自己、为国家发出的呐喊。虽然几次学潮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逐渐进入低潮，但一批像蔡和森一样的赴法留学生在法国的学习、劳动与革命斗争中成长觉醒，最终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成为建设国家和党的中坚力量。

D 共产主义先驱扬帆《向导》：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

决定，蔡和森筹备创办党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并担任主编。

《向导》以发表时事政治评论文章为主，其使命在于宣传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并引导群众积极参与斗争。除此之外，《向导》也揭露和批判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使得中国百姓逐步建立了对于帝国主义的理性认识。在短短数年内，《向导》周报的发行量由几千份扩大到10多万份。《向导》共发行201期，蔡和森主编了超过一半的期数，同时也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单独署名的文章达130多篇，联合署名的文章有近40篇。可以说，《向导》不仅是具有舆论指导地位的党中央机关报，也成为黑暗中4亿中国同胞思想心灵上的“向导”，而蔡和森就是《向导》之灵魂。

随着《向导》在人民群众中的普

及，人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情绪已“暗潮涌动”。1925年五卅惨案激起了全民族的愤怒和反抗，神州大地到处激荡着反帝爱国的声浪。就在这时，蔡和森又发挥了他的领导作用。与此同时，《向导》紧扣反帝反封建的主题，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策略方针，保证了反帝爱国运动的健康发展。

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与传播不止于此。他是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书写社会发展史的中国人。1925年底，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发表了以《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为题的长篇演讲，详细回顾了1925年中央第二次扩大执委会议的历史，并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党的历史任务和各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深刻分析。因此，这篇演讲也被视作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党史著作。

E 烈焰如炬：英勇的牺牲与精神的永恒

时可能面临的危险，他依旧事必躬亲，日复一日地前往秘书处批阅文件，积极开展工作。这是一段充满挑战的岁月，他身处四面楚歌的险境。一方面，粤港两地的局势高度紧张，对外地口音的人盘查得非常严密；另一方面，香港潜伏的叛徒帮助敌人四处搜捕共产党人。然而，蔡和森并未被重重压力击垮，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坚持革命工作。

1931年6月10日，香港海员工会召开会议，蔡和森明知风险重重，却依然决定亲自参会。他身边的同志都劝他不要冒这个险，但蔡和森深知会议的重要性，认为自己必须在场。不幸的是，在会上他被叛徒认出并被逮捕，两天后被引渡回广州，1931年8月4日在广州英勇就义，年仅36岁。

(据中国教育新闻网)

宋代的“依法治国”

宋代的统治者有着自觉的法治意识，认为“法制立，然后万事有经，而治道可必”。所以太祖立国，“革五代之弊，创立法度”，之后历朝修订法律，到仁宗朝时，已是“法严令具，无所不有”。

宋朝法制体系之繁密，可能超出许多人的想象。宋人叶适这么描述道：“今内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极一世之人志虑之所周决，忽得一智，自以为甚奇，而法固已备之矣，是法之密也。”一个聪明人，穷尽一生的智慧，想出一项立法，自以为新奇，但查一下法律汇编，却发现类似的法条早已制订出来了。如此周密的立法，甚至产生了副作用，“人之才不获尽，人之志不获伸，昏然俯首，一听于法度”。

尽管“任法”带来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宋人还是清醒地认识到，“法治”毕

竟要比“人治”更优良。用陈亮的话来说，“举天下一听于法，而贤者(虽然)不足以展布四体，奸宄亦不得以肆其所欲为”；“人心之多私，而以法为公，此天下之大势所以日趋于法而不可御也”。今日许多人也不认为，西方社会正是以“人性自私”为预设，从“防恶”的初衷出发，才发展出一套法治制度的吗？

陈亮相信，法治已是大势所趋，而人治不可恢复：“天下之大势一趋于法，而欲一切反之于任人，此虽天地鬼神不能易，而人固亦不能易矣。”因为，“法令之密，而天下既已久行而习安之，一旦患贤智之不得以展布四体，而思不恃法以为治，吾恐奸宄得以肆其所欲为，而之忧反甚于今日也”。

如果仅仅是崇尚法制、法条严密，那还不能说是“法治”，法治的要旨在于权

力(包括皇权)也要接受法的约束，君权不能成为违法的挡箭牌。宋人有一个法制观念：“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也……故王者不辨亲疏，不异贵贱，一至于法。”(宋代李觥《直讲李先生文集》)这才是法治的精髓。宋太宗时，任开封府尹的许王赵元偁因为犯了过错，被御史中丞弹劾。元偁心中不平，诉于太宗跟前：“臣天子儿，以犯中丞故被鞫，愿赐宽宥。”太宗说：“此朝廷仪制，孰敢违之！朕若有过，臣下尚加纠擿；汝为开封府尹，可不奉法邪？”最后，贵为皇子的赵元偁“论罢如死”。

其实宋太宗也曾经想庇护犯法的亲信，只是受大臣抗议，只得作罢——话说陈州团练使陈利用恃宠受太宗宠爱，“恣横无复畏惮”，杀人枉法，被朝臣弹劾，本应处死刑，但太宗有意袒护他，说：“岂有

万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赵普抗议道：“此巨蠹犯死罪十数。陛下不诛，则乱天下法。法可惜，此一竖子，何足惜哉。”太宗最后不得不同意判陈利用死刑。

法家也讲究任法，但法家认为君主是绝对立法者，如汉代酷吏杜周干脆宣称：“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什么是法律，由皇帝说了算。宋朝的立法即是则天，执法则是奉天：“礼者，天则也……夫赏、天命、罚、天讨也。天子，奉天而行者也。赏罚而一毫，不得其当，是慢天也；慢而至于颠倒错乱，则天道灭矣。灭天道则为自绝于天。”显然，天高于皇权，天子应当服从于天，换言之，即服从于则天的礼法。这便是宋代儒家的法治观。(据《联谊报》)

文人轶事

夏衍主办《救亡日报》

1937年8月24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了《救亡日报》，夏衍出任总编辑。

《救亡日报》是以宣传抗日为主的四开报纸，主要栏目有战局鸟瞰、战事报道、社论、世界一日、救亡知识等，专门刊发特写、评论、战地采访、战局分析和文艺作品。毛泽东、宋庆龄、何香凝、茅盾、巴金、邹韬奋等人，都为《救亡日报》写过稿。为了增加宣传效果，每期报纸的边线之外，均印有各种醒目的口号，很受民众的欢迎。《救亡日报》每天可销1000份，最多时销售3500多份，是国统区影响很大的新闻报刊。

《救亡日报》的采编人员有十多个，他们不拿薪水，写稿不要稿费，甚至上下班的交通费也自己负担。总编辑夏衍不仅负责报纸的编辑、发行、印刷、对外联络、约稿工作，还深入前线冒着枪林弹雨采访。有一次他和田汉去嘉定前泊阵地，一路上遇到敌机轰炸，他们一次次跳下车，躲到树下或稻田里。敌机一飞走，再连忙赶路。一天夜里，他们从被炸得只剩下一半的桥面上通过，很是惊险。

上海沦陷后，《救亡日报》在出完第85期后迁至广州。广州沦陷后，《救亡日报》又转移到桂林。为了让群众认清日寇的侵略本质，提高抗战必胜的信心，夏衍每天几乎不停笔地写社论、短评、杂感、散文、通讯。他撰写的《失去了太阳的都市——上海》《广州在轰炸中》《把这叱史上主义的惨剧记录下来》等重头文章，“不是论文，却比论文更深刻；不是纪事，却比纪事更生动”。报社同仁送给夏衍一副对联，表达心中的敬意：“文章怀真理而俱来，脑汁比墨汁而齐下。”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夏衍因拒绝刊登国民党中央社诬蔑新四军的消息，而被通缉。随后，《救亡日报》也被迫封闭。夏衍接到撤离通知后，乘坐小飞机飞往香港，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据《人民政协报》)

一顿饭感念一辈子

1923年，为了使自己的生活“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个新鲜的桥”，20岁出头的文学青年沈从文，决定“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得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

到了北京，沈从文才知道，单枪匹马闯世界一点儿也不浪漫，尽管有高涨的写作热情，但屡屡投稿不中，他只好在北京大学做了一名旁听生。没有收入，从家里带来的钱也所剩无几，他每天吃两个馒头就成菜了事。这样的“好日子”勉强熬到冬天就再也难以继，直至囊中空空地躲在没有火炉的出租屋里，裹着棉被看《史记》艰难度日。

近乎绝望的沈从文，硬着头皮给京城的几位知名作家写信，希望他们能伸手帮自己圆了“作家梦”。

求助信写了几十封，作出回应的只有郁达夫。郁达夫看了沈从文的信后，当即决定去看看这位文学青年。于是，郁达夫走进了那个没有炉火的“窄而霉小斋”。映入郁达夫眼帘的是，沈从文身穿一件单衣，拥着棉被坐在凉炕上，一边哈气，一边用冻得红肿的手在坚持写作。

此情此景，让郁达夫感动得眼圈发红。他当即解下自己的围巾给沈从文戴上，又用一个上午倾听沈从文的“心声”。当听沈从文说他已经三天没有吃饭时，便马上拉着他到西单牌楼附近的“四如春”饭馆去撮一顿。饿极了的沈从文也顾不得什么斯文了，吃得狼吞虎咽。

这顿饭共花去一元七角多。郁达夫掏出一张五元的票子付完账后，又将剩余的三元多钱全都给了沈从文。

就是这简单的一顿饭，让沈从文记了一辈子。事隔半个多世纪后，郁达夫的侄女郁风去拜谒已是大作家的沈从文，沈从文对那顿饭依然念念不忘，感慨道：“那情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他(郁达夫)拿出五块钱，同我出去吃了饭，找回来的钱都送给我了。那时候的五块钱啊！”

(据《联谊报》)

吕思勉以猫为友

史学家吕思勉喜欢养猫。据他回忆，“九岁始好猫”，当时家里养的猫都是他的“猫友”。后来，他随父亲赴江浦县求学，特意带上猫作伴。在江浦县，吕思勉又新养了3只猫，加上原来那几只，就是4位“猫友”，他分别为它们取名“志道”“据德”“依仁”与“游艺”。据悉，吕思勉一生中大约养过二三十只猫。

吕思勉爱猫几近痴迷。有一次，吕思勉路过常州东门外，看到养老堂东庑下卧着一只金黄色的猫，不由心生欢喜。堂中人原就讨厌这猫，见他盘桓不去，就说：“若真喜欢，就带走！”吕思勉大喜过望：“你把猫送到我家，我给钱二百。”那人果然高兴地送来了。还有一次，吕思勉与学生逛岳庙，在宠物铺里看到一只白色卷毛波斯猫，但索价“稻米十石”。他望“猫”兴叹，“细细观赏了好一会才离去”。

吕思勉的夫人也爱猫。为了防止猫失足坠落，吕思勉把家中的水井都盖得严严实实。有人嗤笑他过虑，吕思勉竟动用考据功夫，援引《辘辘集》，证实古已有其事。吃饭时，猫爬上饭桌，把吕思勉桌上的菜打下来吃，他也不生气，只是笑笑而已。

为了分享自己养猫的快乐，吕思勉写下《猫友纪》《太平畜》《猫救子》等随笔，认为“猫者，太平畜也，人爱其柔仁，与之之为友，而无所利也”。他还为猫编撰专史，题曰《猫乘》，汇集了所能搜集到的古今中外猫的掌故，例如《猫寿》《猫食》《猫相》《猫赛》等等。

上海“孤岛”时期，吕思勉以“野猫”为笔名，写下了《武士的悲哀》《眼前的奇迹》等系列文章，抒发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有一段时间，他常在信线一角盖印上他自刻的猫图案印章，“章仅盈寸，造型简朴，苍劲如汉印”。

晚年，吕思勉每与常州来的乡亲谈完正事，总会问一句：“到我家，见过阿黄吗？”当听说小黄猫“四日未归”，竟然积忧成梦。1957年，吕思勉病逝。夫人在他的遗体边放了一支钢笔、一块表与一张猫的照片，与他洒泪而别。

(据《人民政协报》)